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金寨县样本数据为例

程明¹ 钱力² 倪修凤² 吴波³¹

(1. 中共六安市委党校, 安徽 六安 237000;

2.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3.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 文章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试点村作为一次自然实验, 基于安徽省金寨县微观调研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各维度效度较高, 但各维度效度差异性较大, 其中产业兴旺效度最高; 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效度; 劳动力结构、本地务工情况以及交通便利性等能够对提升乡村振兴效度产生较大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协同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 持续推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以产业扶贫促进产业振兴, 切实发挥乡村振兴试点村的引领作用,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关键词】: 深度贫困地区 乡村振兴 效度评价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20) 04-0016-11

一、问题提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反贫困始终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项历史使命。我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将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以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为工作重点, 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等一系列精准扶贫举措(张国建, 2019)^[1]。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8年的1660万人, 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 累计减少8239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8年的1.7%, 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建档立卡贫困村从2012年的12.8万个减少到2018年的2.6万个, 累计10.2万个贫困村脱贫退出; 全国832个贫困县已经有153个宣布脱贫摘帽, 减贫成效显著^①。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和机制创新研究”(19BJY1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17BJY134)

作者简介: 程明(1989), 男, 安徽六安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

钱力(1981), 男, 安徽定远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农村经济;

倪修凤(1996), 女, 安徽合肥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管理科学;

吴波(1970), 男, 安徽六安人, 教授, 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与城镇化。

胜期、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拉开帷幕，如何加快建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机制、形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的良好互动格局是现阶段紧迫且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魏后凯，2019）^[2]。

文章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参考依据，选定“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作为深度贫困地区^②，贫困程度深、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是脱贫攻坚战中的主战场，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环节。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丰富，涵盖了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方面、全方位建设内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在有效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更广领域、更实举措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是破解“三农”问题及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科学度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将为分类指导各地区各部门乡村振兴进程提供量化依据；对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进行科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更有利于评价、对比、监测各地区乡村振兴实施效果，发现总结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践经验，进而提升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水平。安徽省金寨县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大别山腹地，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是安徽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山区县和旅游资源大县，是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典型的深山区、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地形复杂，脱贫攻坚工作难度较大，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有效实施更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此，以安徽省金寨县为例，进行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二、相关文献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是历史上乡村振兴思想在新阶段的延伸，是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思想与中国农村发展思想的融会贯通（张海鹏，2018）^[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期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张军，2018）^[4]，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韩俊，2018）^[5]。在借鉴日本（曹斌，2018）^[6]、欧盟（芦千文，2018）^[7]等国外农业农村政策的基础上，要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的实际出发（黄祖辉，2018）^[8]，坚持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导向（姜长云，2018）^[9]。

乡村振兴效度评价是度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制定并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与模式、更好运用于乡村振兴实践的关键基础。分析已有文献发现，众多学者大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五个目标要求来构建乡村振兴效度评价指标体系，而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呈现多样化特征，如单一使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贾晋，2018）^[10]、结合主成分分析与专家打分法两种方法综合赋权（闫周府，2019）^[11]、运用层次分析法与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指标权重（郑兴明，2019）^[12]、选取层次分析法与熵值赋权法相结合的方法计算指标权重（李鲁，2019）^[13]等。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融合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在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丁静，2019）^[14]，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汪锦军，2019）^[15]。除此之外，诱致性制度变迁（谢治菊，2019）^[16]、绿色金融（王波，2019）^[17]、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刘刚，2019）^[18]等多方面因素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性、整体性与精准扶贫战略的紧迫性、局部性之间的客观差异，导致两大战略的对接面临较大挑战（徐晓军，2019）^[19]。系统梳理两大战略间的内涵联系，探析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路径（边慧敏，2019）^[20]，如生态扶贫与生态振兴具有内在一致性（胡钰，2019）^[21]，在“两山理论”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王习明，2018）^[22]。具体到深度贫困地区，深入解析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工作协同推进的理论逻辑及其在规划、主体、组织、载体与监管等多方面协同机制（郑瑞强，2018）^[23]，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根本路径以及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牛胜强，2019）^[24]，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走出“两山困境”（于开红，2018）^[25]，以期形成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有机衔接、成效互促的良性联动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内涵、评价、影响因素及其与精准扶贫战略协调推进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并已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针对乡村振兴效度评价，创新点主要集中于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方面，评价方法及评价结果可靠性方面创新性不足；其次，对乡村振兴效度进行综合评价后，进一步分析提升乡村振兴效度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还相对较少；最后，探析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协同推进方面的研究较多聚焦在定性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中相关定量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第一，合理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等调研方式获取安徽省金寨县微观调研数据，以此为样本数据进行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确保样本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第二，基于安徽省金寨县样本数据，选取常用于评估政策效应的双重差分法对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进行综合效度评价，提高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创新性；第三，对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各维度效度进行科学评价后，定性分析提升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的影响因素，使得研究深度进一步延伸。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

自 Ashenfelter、Card(1985) 的开创性工作以来^[26]，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效果评估，小到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目标价格制度对大豆播种面积的影响（贺超飞，2018）^[27]、检验房地产限购政策能否有效抑制企业投资“脱实向虚”趋势（胡宁，2019）^[28]等，大到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国家税制改革的政策效果（Feldstein, 1995；周黎安，2005）^[29, 30]、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全方位评析（Lu, 2015；吕越，2019）^[31, 32]等。双重差分方法主要研究思路在于将受到政策影响的个体或地区作为处理组，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个体或地区作为对照组，在处理组与对照组自身条件相当的前提下，利用两组在政策作用期间的绩效指标等变化量差值即双重差分估计系数来表示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影响后政策实施的净影响效果。

具体到本文来看，为评估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试点村作为一次自然实验，以金寨县为例，被调查村庄按是否被列为乡村振兴试点村划分为乡村振兴试点村即处理组、乡村振兴非试点村即对照组，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间将选定年份划分为政策实施前与政策实施后两个时期，通过对比处理组与对照组在两期的变化量差值进行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依据相关政府文件，结合调研结果与研究目的，选定青山镇尧塘村⁽³⁾、全军乡梁山村、熊家河村与全军村⁽⁴⁾ 4个乡村振兴试点村组成处理组，茅坪村、抱儿山村、前龙村、何家湾村、沙河店村等 25 个乡村振兴非试点村组成对照组⁽⁵⁾。依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等相关政府文件可知乡村振兴战略于 2018 年正式实施⁽⁶⁾，因此将 2018 年作为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节点年，选取距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最近一年即 2017 年作为政策实施前的时期；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考虑到 2018 年刚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且政策实施需要做好前期工作准备与一定的时间积累，因此将 2019 年作为政策实施后的时期。据此，设定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评价的基本 DID 模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_{it} + \alpha_2 control_{it} + \b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村和年； Y_{it} 是因变量，指的是乡村振兴效度值，用来表示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did_{it} 是核心解释变量，且 $did_{it} = treatment_i \times post_t$ ， $treatment_i$ 与 $post_t$ 分别代表地区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样本时期内，如果金寨县 i 村被设为乡村振兴试点村，则 $treatment_i = 1$ ，反之为 0；当所研究的样本时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则 $post_t = 1$ ，反之为 0； $control_{it}$ 表示随 i 和 t 变动的控制变量； β_i 表示个体效应，防止出现个体异质性； γ_t 表示时期效应，控制一系列随时间变化而对政策效果评估产生影响的时间因素；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估计系数 α_1 表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效应，即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政策实施前后相比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变化，若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则 α_1 显著为正。

为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否会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产生政策溢出效应，本文设置了虚拟变量 $near_i$ ，样本时期内，如

果金寨县 i 村是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则设定为处理组，neari=1，反之为 0，即为对照组，由原来的对照组剔除了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后的村。根据各样本村地理位置的远近，选取青山镇茅坪村与全军乡前龙村、何家湾村、沙河店村 4 个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作为溢出效应模型中的处理组，抱儿山村、姜河村、汤店村等 21 个非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作为溢出效应模型中的对照组，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溢出效应。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交互项 didlit(didlit=neari×postt), didit 取值为 1 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深度贫困地区金寨县部分试点村邻近村的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其他情况均取值为 0，并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Y_{it} = \chi_0 + \chi_1 didlit_{it} + \chi_2 control_{it} + \b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估计系数 χ_1 表示乡村振兴战略溢出效应，若乡村振兴战略存在对试点村邻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则 χ_1 显著为正；若乡村振兴战略存在对试点村邻近地区的负向溢出效应，则 χ_1 显著为负。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综合的发展战略，其效度值相应也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概念，仅仅以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或其增长率等单个变量来代表或衡量是片面的，因此需要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进而测算得到一个乡村振兴效度值，以代表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作为本研究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依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与《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等战略规划中的乡村振兴分类及其主要指标构成，借鉴张挺（2018）^[33]、韦家华（2018）^[34]等学者所构建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 5 个维度选取共 25 个指标构建乡村振兴效度测算指标体系，用以测算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综合发展水平。由于各维度各指标对乡村振兴效度的影响程度不同，选取熵值法计算并确定各维度各指标的权重系数。所构建的乡村振兴效度测算指标体系及其相对应的权重系数见表 1 所列。

表 1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测算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维度层	指标层	单位
深度贫困地区 乡村振兴效度色测算	产业兴旺 (0.276)	农业机械化比重 (0.087)	%
		非农产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 (0.029)	%
		特色产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 (0.094)	%
		农户参加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比重 (0.065)	%
	生态宜居 (0.178)	农户对村庄绿化的满意率 (0.032)	%
		安全饮水普及率 (0.034)	%
		农户使用卫生厕所比重 (0.041)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25)	%
		清洁燃料使用率 (0.023)	%
		生活信息化覆盖率 (0.023)	%
	乡风文明 (0.148)	农户对乡村两级公共文化^务满意率 (0.043)	%
		农户文化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0.044)	%
		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0.040)	年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次数 (0.021)	次
	治理有效 (0.165)	农户对法治乡村建设的满意率 (0.058)	%
		农户对政务村务公开的满意率 (0.023)	%
		农户对乡村干部廉洁的满意率 (0.022)	%

		选举等重大决策事项村民参与率 (0.044)	%
		贫困人口发生率 (0.018)	%
	生活富裕 (0.233)	农户对现在生活条件的满意率 (0.053)	%
		农户对子女受教育条件的满意率 (0.040)	%
		农户对医疗保障条件的满意率 (0.053)	%
		农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0.047)	元
		恩格尔系数 (0.012)	%
		拥有两件以上家用电器类耐用消费品家庭的农户比重 (0.027)	%

注：括号内为权重系数。

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乡村振兴试点村交互项 did_{it} ，根据相关政府文件确定深度贫困地区金寨县若干乡村振兴试点村，设置试点村虚拟变量 $treatment_i$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与实施时间确定政策实施前与政策实施后两个时期，设置时间虚拟变量 $post_t$ ，通过两个虚拟变量的乘积最终确定核心解释变量 $didit$ 。 $didit$ 取值为 1 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深度贫困地区金寨县部分试点村的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其他情况均取值为 0， did_{it} 估计系数 α_1 表示乡村振兴效率评价，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于乡村综合发展能够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则 α_1 显著为正。

控制变量。除了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会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还有其他很多会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因此还要控制这些外生影响因素的干扰。借鉴王敬尧（2018）^[36]、陈庚（2018）^[36]、姜长云（2019）^[37]、刘景琦（2019）^[38]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考虑到土地流转、医疗健康、公共文化服务以及特色产业发展等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影响，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利用农户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了解程度来衡量乡村振兴战略普及程度（know）；选取非农产业劳动力人口数占总劳动力人口数比重来反映劳动力结构（lab）；村民和睦程度（dispute）采用农户家庭年均纠纷发生次数来衡量；利用本地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来度量本地务工情况（local）；选取土地流转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来衡量土地流转情况（land）；以医疗健康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来反映医疗健康情况（health）；农业生产情况（agri）采用农业生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来衡量；以农户对交通便利性的满意率来度量交通便利性（tra）；公共文化服务水平（cul）主要通过农户对本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率来衡量；以农户对本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满意率来反映特色产业发展情况（fea）；村庄整体规划程度（plan）采用农户对村庄整体规划的满意率来度量；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pov）选取农户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率来衡量。

其他变量。以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 $did1_{it}$ 来衡量乡村振兴战略是否存在溢出效应，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得到的产业兴旺效度值（ind）、生态宜居效度值（eco）、乡风文明效度值（cus）、治理有效效度值（gov）、生活富裕效度值（life）分别用来反映乡村振兴战略各维度发展水平，进一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影响因素。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见表 2 所列。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基于变量选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课题组在 2017 年和 2019 年对深度贫困地区金寨县 29 个村的微观调研数据。农户问卷的调查内容不仅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户属性、贫困情况、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家庭非农产业劳动力人口数、家庭收支情况等基本信息，还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的专项信息、满意度调查与发展需求等多方面信息。调研过程均采用一对一、面对面的深度访谈方式，共发放 60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总计获得 585 份有效问卷（其中乡村振兴试点村 106 份，非试点村 479 份），有效率达到 97.5%，确保样本数据有效性、科学性。为凸显乡村振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即对照组与处理组在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期的差距，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仅报告变量的均值及其各自标准差。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对比结果见表 3 所列。

表 2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变量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效度值 (rev)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
核心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试点村 (did)	did=treatmentxpost
控制变量	乡村振兴战略普及程度 (know)	农户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了解程度
	劳动力结构 (lab)	非农产业劳动力人口数占总劳动力人口数比重
	村民和睦程度 (dispute)	农户家庭年均纠纷发生次数
	本地务工情况 (local)	本地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土地流转情况 (land)	土地流转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医疗健康情况 (health)	医疗健康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
	农业生产情况 (agri)	农业生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
	交通便利性 (tra)	农户对交通便利性的满意率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cul)	农户对本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fea)	农户对本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满意率
	村庄整体规划程度 (plan)	农户对村庄整体规划的满意率
	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pov)	农户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率
其他变量	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 (did1)	did1=nearexpost
	产业兴旺效度值 (ind)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
	生态宜居效度值 (eco)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
	乡风文明效度值 (CUS)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
	治理有效效度值 (gov)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
	生活富裕效度值 (life)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对照组变量平均值		处理组变量平均值		变量	对照组变量平均值		处理组变量平均值	
	2017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9 年
rev	50.879 (3.206)	58.261 (3.971)	66.755 (1.794)	84.620 (3.333)	local	5.718 (0.711)	9.378 (0.783)	8.833 (0.528)	13.375 (0.854)
ind	14.058 (0.886)	16.098 (1.097)	18.445 (0.499)	23.380 (0.917)	land	4.028 (0.767)	5.335 (1.256)	4.833 (0.407)	5.500 (0.913)
变量	对照组变量平均值		处理组变量平均值		变量	对照组变量平均值		处理组变量平均值	

	2017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9 年
eco	9.045 (0.571)	10.360 (0.706)	11.870(0.3 20)	15.045 (0.594)	health	10.618 (1.249)	4.858 (0.887)	7.458 (0.417)	3.708 (0.345)
CUS	7.521 (0.473)	8.612 (0.587)	9.868 (0.264)	12.510 (0.493)	agri	14.478 (1.199)	10.468 (1.210)	12.583 (0.290)	8.458 (0.417)
gov	8.399 (0.529)	9.617 (0.656)	11.020 (0.298)	13.968 (0.551)	tra	88.578 (1.293)	93.378 (1.223)	90.083 (0.554)	94.958 (0.947)
life	11.854 (0.747)	13.575 (0.926)	15.555 (0.420)	19.713 (0.776)	cul	84.428 (1.725)	91.568 (1.303)	89.458 (0.887)	95.083 (0.440)
know	50.308 (2.242)	68.628 (0.899)	58.958 (0.947)	72.208 (1.511)	fea	84.158 (1.785)	90.438 (1.660)	89.833 (0.706)	94.125 (2.250)
lab	48.628 (1.941)	68.172 (1.213)	57.375 (2.658)	74.333 (0.780)	plan	85.608 (1.692)	93.748 (1.110)	90.083 (0.554)	94.958 (0.342)
dispute	5.548 (0.739)	3.556(0.52 1)	4.583 (0.290)	2.625 (0.479)	pov	89.749 (2.363)	98.600 (0.968)	96.333 (1.415)	99.333 (0.818)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析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的描述性统计对比结果可知，2017 年乡村振兴试点村即处理组的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高于乡村振兴非试点村即对照组约 15.876,2019 年间提高 26.359，两个时期的效度值变化量差值即二阶差分的结果为提升 10.483，增速达到 33.02%。具体到乡村振兴战略各维度效度值描述性统计对比结果，产业兴旺效度值不仅是 5 个维度中效度值最高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试点村的产业兴旺效度值高达 23.380，占据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的 27.63%，而且是二阶差分结果中提高最快的，两个时期的效度值变化量差值达到 2.896，其他四个维度两个时期的效度值变化量差值分别达到 1.860、1.551、1.730、2.437，效度值均得到明显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控制变量中，仅有村民和睦程度（dispute）、医疗健康情况（health）与农业生产情况（agri）这 3 个变量均值出现递减现象，其他变量均值均呈现显著提升趋势。村民和睦程度（dispute）采用农户家庭年均纠纷发生次数来衡量，家庭年均纠纷发生次数越少，表明村民间越和睦，进而表明乡村治理有效、乡风逐渐文明，与乡村振兴效度评价呈反比例关系；医疗健康情况（health）与农业生产情况（agri）分别以医疗健康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与农业生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来反映，随着分级诊疗、互联网+医疗健康等国家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农业机械化、科学化生产的逐步实现，医疗健康支出与农业生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逐渐降低，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生活需要不断增长，呈现出农户家庭里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逐渐增加的现象，同样会导致医疗健康支出与农业生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逐渐降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乡村振兴效度测算

基于 2017 年、2019 年样本数据，依据本文所构建的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效度测算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各维度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对部分乡村振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进行乡村振兴效度测算，以此衡量该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为进一步研究乡村振兴效度评价奠定基础。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及其各维度效度测算结果见表 4 所列。

表 4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及其各维度效度测算

变量	2017 年		2019 年	
	试点村	非试点村	试点村	非试点村
产业兴旺效度值	18.444	14.058	23.380	16.097
生态宜居效度值	11.869	9.047	15.046	10.359
乡风文明效度值	9.868	7.521	12.508	8.612
治理有效效度值	11.020	8.399	13.969	9.618
生活富裕效度值	15.554	11.855	19.716	13.575
乡村振兴效度值	66.755	50.879	84.619	58.261

分析表 4 可知，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各维度效度较高，但各维度效度差异性较大。2017 年，乡村振兴试点村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为 66.755，非试点村为 50.879；2019 年，乡村振兴试点村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为 84.619，非试点村为 58.261，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显著提升，乡村振兴试点村提高 17.864，非试点村提高 7.382，两个时期的效度值变化量差值达到 10.482，甚至高于非试点村 3.100，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乡村整体发展、综合发展，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更是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细分到各维度，就 2019 年乡村振兴试点村各维度效度值来看，产业兴旺效度值最高，达到 23.380，高于同时期同地区乡风文明效度值 10.872，占据乡风文明效度值的 86.920%；其次为生活富裕效度值，达到 19.716，仅次于产业兴旺效度值 3.664；余下 3 个维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效度值，分别达到 15.046、13.969、12.508，各维度效度差异性较大。对比乡村振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各维度效度值可知，无论是 2019 年还是 2017 年，试点村各维度效度值均高于非试点村，且 2019 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各维度效度值差值高于 2017 年的，各维度效度值二阶差分结果均为显著提升，表明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显著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二）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豪斯曼检验，决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为减小或避免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多重共线性等相关问题的干扰，采用 white 稳健性估计，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观测 did 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性的变化情况。考虑到本文所选用的控制变量有 12 个，限于篇幅限制，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每两个控制变量加入后将模型估计结果合并在一起报告，加上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共汇报 7 组模型估计结果。

可知，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模型的拟合系数逐渐提升，由不加控制变量的模型（1）中的 0.615 逐渐提升至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模型（7）中的 0.710，模型拟合效果越来越好。就交互项 did 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相邻模型之间 did 估计系数差别不大、较为稳定，且每个模型的 did 系数均显著，全部达到 1%的显著性水平；具体到模型（7）回归结果，did 估计系数达到 14.298，t 值为 4.546，且达到 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促进该地区乡村振兴效度值提升 14.298，提升效果显著，进而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性。细化到各个控制变量系数及其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劳动力结构（lab）、本地务工情况（local）、交通便利性（tra）、公共文化服务水平（cul）、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pov）5 个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效度值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村民和睦程度（dispute）、医疗健康情况（health）与农业生产情况（agri）这 3 个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效度值存在显著负向促进作用，其中原因已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部分加以说明，这里不再赘述。乡村振兴战略普及程度（know）、土地流转情况（land）、特色产业发展情况（fea）3 个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效度值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村庄整体规划程度（plan）这一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效度值存在负向促进作用，但不显著，表明乡村振兴战略仅靠政策普及是远远不够的，要付出实际振兴乡村的行动；土地流转收入并不是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不能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长效性，且对于山区来说，土地流转收入微乎其微；特色产业收入已经归纳在产业兴旺效度值测算中，相对而言，农户对特色产业发展的满意率对乡村振兴效度值的提升作用甚微；村庄整体规划难免会侵犯到部分村民的个人利益，且整体规划后产生的社会效益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现，会造成部分村民不理解的现象发生。

（三）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效度的影响因素，将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效度值（ind）、生态宜居效度值（eco）、乡风文明效度值（cus）、治理有效效度值（gov）、生活富裕效度值（life）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依次进行双重差分模型运算与分析。考虑到控制变量对各维度效度值的作用大小不同，进而对乡村振兴效度值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报告 5 个模型中所有控制变量系数及其稳健性检验结果。

可知，核心解释变量 did 估计系数在 5 个维度中均显著为正，分别为 3.943、2.538、2.121、2.362、3.330，表明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各维度效度值；从估计系数数值大小上来看，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对于提升产业兴旺效度值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生活富裕效度值，接下来依次为治理有效效度值、生态宜居效度值、乡风文明效度值。具体到各控制变量，各控制变量对各维度效度值的促进作用方向与其对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促进作用方向大致相同，大部分控制变量能够对各维度效度值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只有村民和睦程度（dispute）、医疗健康情况（health）与农业生产情况（agri）等小部分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产生负向促进作用；所有控制变量对所有维度效度值的估计系数均达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显著性水平，这与其对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的估计系数显著性差异性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各控制变量对产业兴旺效度值的提升作用均为最大，其次为生活富裕效度值，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态宜居效度值、治理有效效度值、乡风文明效度值，总的来说，各控制变量对各维度效度值的提升作用机制与其对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的保持一致。

（四）溢出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是否会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产生政策溢出效应，设置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交互项 $didlit(didlit=neari \times postt)$ ，重新定义处理组与对照组并构建新的双重差分模型，以检验乡村振兴战略是否会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产生政策溢出效应。

无论在是否添加控制变量的模型中，交互项 didl 估计系数均为正数，区别在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模型（8）中，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能够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而加入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模型（9）中，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能够达到 5% 的显著性检验，均能表明乡村振兴战略会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的模型（8）中，didl 估计系数达到 10.003，在添加所有控制变量的模型（9）中仅为 8.131，看似控制变量限制了乡村振兴战略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实则是证明了乡村振兴试点村所享受到的包含在控制变量里的政策实施能够显著提高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从侧面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在试点村所实施的相关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建议推广到非试点村乃至全部乡村。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所有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之前先通过近邻匹配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选用 PSM-DID 方法进行乡村振兴效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为进一步增强稳健性结果的说服力，分别控制个体效应与时期效应，并以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再分别构建模型进行基准回归，通过不同模型运算结果中交互项 did 估计系数的比较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模型（10）（12）（14）均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区别在于模型（10）没有控制个体效应与时期效应，模型（12）控制个体效应、没有控制时期效应，模型（14）同时控制个体效应与时期效应，did 估计系数分别达到 14.147、13.865、13.483，且均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差异性较小。模型（11）（13）（15）均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区别在于模型（11）没有控制个体效应与时期效应，模型（13）控制个体效应、没有控制时期效应，模型（15）同时控制个体效应与时期效应，did 估计系数分别达到 16.954、16.289、15.562，差异性较小，模型（11）与（13）均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模型（15）达到 5% 的显著性检验。总体而言，无论是否控制个体效应与时期效应、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did 估计系数都不会差距较大，与前面基准回归结果中模型（7）基

本一致，因此本文估计结果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各维度效度较高，但各维度效度差异性较大，其中产业兴旺效度最高。乡村振兴效度测算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乡村振兴综合效度值显著提升，乡村振兴试点村提高 17.864，非试点村提高 7.382，两个时期的效度值变化量差值达到 10.482，说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乡村整体发展、综合发展。细分到各维度，就 2019 年乡村振兴试点村各维度效度值来看，产业兴旺效度值最高，达到 23.380，高于同时期同地区乡风文明效度值 11.172，占据乡风文明效度值的 79.98%；其次为生活富裕效度值，达到 19.716，仅次于产业兴旺效度值 3.664；余下 3 个维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效度值，分别达到 15.046、13.969、12.508，各维度效度差异性较大。

（2）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效度。分析乡村振兴效度测算结果，对比乡村振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各维度效度值可知，无论是 2019 年还是 2017 年，试点村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各维度效度值均高于非试点村，且 2019 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各维度效度值差值高于 2017 年的，各维度效度值二阶差分结果均为显著提升，表明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显著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did 估计系数达到 14.298，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促进该地区乡村振兴效度值提升 14.298，提升效果显著。具体到分维度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did 估计系数在 5 个维度中均显著为正，表明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各维度效度值。

（3）劳动力结构、本地务工情况以及交通便利性等能够对提升乡村振兴效度产生较大影响。分析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基准回归结果，大部分控制变量能够对乡村振兴效度值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劳动力结构、本地务工情况以及交通便利性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较高，显著高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表明劳动力结构、本地务工情况以及交通便利性等对提升乡村振兴效度影响较大。

（4）乡村振兴战略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分析溢出效应回归结果可知，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模型（8）中，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交互项 did1 估计系数达到 10.003，且能够达到 10% 的显著性水平；加入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模型（9）中，乡村振兴试点村邻近村交互项 did1 估计系数为 8.131，且能够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均能说明乡村振兴战略会对试点村周边邻近地区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

（二）对策建议

（1）协同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明确深度贫困地区发展资源禀赋特征的基础上，找准乡村发展突破区与着力点，制定科学合理且具有特色的乡村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项目等乡村综合发展规划，进一步引领并融合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规划与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做到规划协同。强化在精准扶贫实践中治理有效的乡村组织体制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中要继续巩固乡村党支部在战略引领与实践指导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项目决策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做到组织协同。厘清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协同推进的理论联系，进一步做到载体协同、主体协同以及监管协同等。

（2）持续推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以产业扶贫促进产业振兴。产业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经济基础，建立农户稳定增收与持续减贫的长效机制离不开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同样需要产业支撑，实证结果同样证明产业兴旺对提升乡村振兴效度的重要作用。深度贫困地区具备发展特色产业的潜力，难点在于如何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关键要推动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品牌效应为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抓手，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产业链以实现产

业化。乡村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当地农户劳动力结构，乡村产业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户是否会返乡、选择在本地务工，进而实现人才振兴。因此要大力整合“人、地、钱”等发展要素，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城乡联动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3) 切实发挥乡村振兴试点村的引领作用。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特色性，综合确定乡村振兴试点村、示范区等先行先试地区，将在试点村得以有效实施的乡村振兴政策推广至周边地区，更好发挥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溢出效应，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提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度，实证分析结果同样证明乡村振兴试点村政策的有效性。切实发挥好乡村振兴试点村的先锋作用，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先试先行，在集体经济发展上先试先行，在乡村有效治理上先试先行。

(4)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乡村基础设施是产业兴旺的关键基础，销售成本，良好的通讯基础设施能够加快生产要素与商品的流通速度，实证结果同样证明交通通达性对提升乡村振兴效度的重要影响。科学制定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管理机制与监督机制等；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构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融资格局；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定价制度、农户缴费制度、运营补偿制度等配套制度，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国建, 佟孟华, 李慧, 等.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8): 136-154.
- [2] 魏后凯. 当前“三农”研究的十大前沿课题[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4): 2-6.
- [3] 张海鹏, 锆亮亮, 闫坤.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1): 2-16.
- [4] 张军. 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 2-10.
- [5] 韩俊. 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J]. 管理世界, 2018(8): 1-10.
- [6] 曹斌. 乡村振兴的日本实践: 背景、措施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8): 117-129.
- [7] 芦千文, 姜长云. 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0): 119-135.
- [8] 黄祖辉.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4): 2-12.
- [9] 姜长云. 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J]. 管理世界, 2018(4): 17-24.
- [10] 贾晋, 李雪峰, 申云. 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18(11): 70-82.
- [11] 闫周府, 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 2019(6): 90-103.
- [12] 郑兴明. 基于分类推进的乡村振兴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来自福建省 3 县市 6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J]. 社会科学, 2019(6): 36-47.

-
- [13]李鲁,李剑芳,钱力.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以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9-35.
- [14]丁静.新时代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融合及协调推进[J].社会主义研究,2019(5):74-81.
- [15]汪锦军,王凤杰.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城乡多元互动的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9(11):51-57.
- [16]谢治菊.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塘约经验的分析[J].探索,2019(6):173-182.
- [17]王波,郑联盛.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1):84-88.
- [18]刘刚.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研究[J].理论探讨,2019(6):118-123.
- [19]徐晓军,张楠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对接:逻辑转换与实践路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01-108.
- [20]边慧敏,张玮,徐雷.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2019(4):40-46.
- [21]胡钰,付饶,金书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中的生态环境关切[J].改革,2019(10):141-148.
- [22]王习明,高扬.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乡村振兴之路[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94-100.
- [23]郑瑞强,赖运生,胡迎燕.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协同推进策略优化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6):762-772.
- [24]牛胜强.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困境及发展思路[J].理论月刊,2019(10):124-131.
- [25]于开红,付宗平,李鑫.深度贫困地区的“两山困境”与乡村振兴[J].农村经济,2018(9):16-21.
- [26]ASHENFELTER O,CARD D. Using the Longitudinal Structure of Earning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raining Program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5 (4):648-660.
- [27]贺超飞,于冷.临时收储政策改为目标价格制度促进大豆扩种了么?——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9):29-46.
- [28]胡宁,王雪方,孙莲柯,等.房产限购政策有助于实体企业“脱虚返实”吗——基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J].南开管理评论,2019(4):20-31.
- [29]FELDSTEIN M. The Effect of Marginal Tax Rates on Taxable Income:A Panel Study of the 1986 Tax Reform Ac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551-572.
- [30]周黎安,陈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J].经济研究,2005(8):44-53.

[31]LU Y, YU 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 Dispersion: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2015(4):221-253. [32]吕越, 陆毅

[32]吕越, 陆毅, 吴嵩博, 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 2005-2016 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J]. 经济研究, 2019(9):187-202.

[33]张挺, 李国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8):99-105.

[34]韦家华, 连漪.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8(9):82-85.

[35]王敬尧, 王承禹. 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4):91-97.

[36]陈庚, 崔苑.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特征、影响及其优化——基于 25 省 84 个行政村的调查研究[J]. 江汉论坛, 2018(11):153-160.

[37]姜长云.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重大战略问题探讨[J]. 经济纵横, 2019(1):10-18.

[38]刘景琦. 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2):24-32.

注释:

1 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脱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 网址为 http://www.cpad.gov.cn/art/2019/2/20/art_2241_301.html.

2 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发布的《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网址为 http://www.gov.cn/zhengce/2017-11/21/content_5241334.htm.

3 资料来源于《青山镇 2018 年度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 网址为 <http://www.ahjinzhai.gov.cn/openness/detail/5d4e87d38aa2baef472b0fe2.html>

4 资料来源于《全军乡 2018 年乡村振兴试点村工作实施方案》, 网址为 <http://www.ahjinzhai.gov.cn/openness/detail/5d4e88fb8aa2baef4730e29c.html>.

5 25 个乡村振兴非试点村共包括前龙村、何家湾村、沙河店村、茅坪村、抱儿山村、姜河村、汤店村、水坪村、南峻村、陈冲村、七邻村、宋河村、响塘村、余岭村、袁岭村、王湾村、留坪村、司马村、官池村、黄集村、黄尖村、迎河村、张冲村、黄峻村、官田村。

6 资料来源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网址为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5325534.htm?trs=1>.